

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以泉州为例

郭阿娥¹, 范正义²

(1.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福建 泉州 362000; 2.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政治上,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正统”意识与“寻根”意识有利于促进政治和谐; 经济上,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蕴含的商品交换意识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文化上,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有利于促成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 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泉州; 宗教与民间信仰; 和谐社会; 影响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736(2010)03-0013-06

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后, 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 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不过,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 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索, 其结论因缺乏田野实证材料的支撑而显得单薄。其次, 个别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成果, 也往往因调查地点的典型性不够, 而使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 选择一个典型地区作深入的田野调查, 有助于克服已有研究的不足。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 号称“世界宗教博物馆”, 是我国各省区中宗教与民间信仰最为繁盛发达的地区之一, 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因此, 以泉州为个案,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这一课题。本文中, 笔者利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资料, 对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泉州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一、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政治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政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 当代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与活动, 对于当前的政治和谐来说, 利大于弊, 是有助于推动泉州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

首先,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一种政治上的

“正统”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 广大信众会积极主动地向当前政治靠拢。而广大信众对当前政治认同感的增强, 有利于促进和谐政治局面的出现。

从历史上看,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强烈的追求王朝敕封的“正统”意识。这种“正统”意识极富弹性, 能够伸缩变化以适应不同的时代环境。例如, 泉州市区圣公宫奉祀的主神倪国忠, 生前为抗元义士。倪国忠最初获得民众的立庙奉祀, 是因为他是反抗“异族”入侵的英雄, 是汉族忠义观的践行者。但是, 元王朝的统治稳固后, 民众的“正统”意识发生了变化, 信徒间开始流传倪国忠在元顺帝时显灵到皇宫灭火, 并为皇后解除产厄而被敕封为“昭福侯”的说法。倪国忠从抗元英雄变成了护元英雄。

上述这种颇具弹性的“正统”意识, 在当代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仍然可以发现。例如, 适应当前两岸妈祖文化交流渐趋活跃的趋势, 一些政府发言人在相关的谈话中, 主动将妈祖称为“海峡和平女神”。政府的这一定位, 提供给民间信徒一个政治认同的机会, 泉州的一些妈祖庙在罗列历史以来妈祖所获得的封

收稿日期: 2010-03-30

基金项目: 泉州市社会科学 2009 年规划课题项目 (2009C-YZ09)。

作者简介: 郭阿娥 (1979-), 女, 福建南安人,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硕士, 研究方向: 民间信仰与文物考古; 范正义 (1974-), 男, 福建永安人,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宗教信仰文化。

号时,煞有介事地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敕封海峡和平女神”这么一句。民间信徒的这一做法,反映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正统”意识“与时俱进”的特征,这种“正统”意识的存在有助于广大信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动调整自身,以更好地与新的时代环境相适应。

在“正统”意识的引导下,广大信众在举办宗教活动时,大多能够紧随政治形势,把宗教活动与当前的政治主题联系起来。例如,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晋江市深沪镇宝泉庵结合这一时代背景,聘请武当山道教协会和永春县道教协会的经乐团前来主持太平清醮法会,“悼念、祭奠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及死难同胞”^{①(P61)}。无独有偶,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南安市诗山镇凤山寺也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祈祷国泰民安法会”,同时还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图片展与座谈会^{②(P47)}。以上这些斋醮法会活动是在纪念抗战胜利的主题下举行的,其仪式环节显然会涉及纪念抗战胜利的内容,广大信众处身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前时代主题的潜移默化,他们对当前政治的认同感自然也会随之增强。

其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强烈的“回归中土”的信仰意识。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这种信仰意识的存在,有利于联系海外三胞,增强华夏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詹石窗教授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中含有眷念故土的寻根情结。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中,“中土”是最尊贵的,“四方”的文化都来源于“中土”,由此形成了“中土—四方”的观念,回归“中土”的意识是民众寻根的动力来源^[1]。我们认为,“中土—四方”观念里的“中土”与“四方”是相对而言的,“中土”指的是文化发源地,“四方”指的是该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因此,“中土”与“四方”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在对“中土—四方”的理论作出上面这样的说明后,我们就能够运用这一理论架构来解释闽台地区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现象。在闽台一带,起源地(祖庙)被信徒视为“中土”,其他的同祀这一神祇的庙宇所在地被视为“四方”。在寻根意识的促动下,“四方”的信徒通过谒祖进香等方式与“中土”保持联系,实现向“中土”的回归。

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历史上,泉州民众东渡台湾、南下东南亚时,鉴于海途危险,大多携带家乡神祇护航,到台湾与东南亚后,再建庙奉祀。泉州的宗教与民间信仰,随着泉州

人的脚步,传播到台湾与东南亚一带。在这个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泉州本土的寺庙,作为台湾与东南亚地区宗教信仰的文化起源地,很自然地被视为“中土”,而台湾与东南亚的寺庙,则成为“四方”。按照“中土—四方”的理论架构,“四方”的信徒在寻根意识的促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向“中土”的回归。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四方”向“中土”的回归也越发频繁。例如,据《泉郡富美宫志》记载,从1988年6月到1997年9月的十年间,泉州富美宫接待了嘉义镇安宫、云林聚宝宫、台中聚善宫、台南金唐殿、彰化富美宫等数十个台湾同祀宫庙214批次的谒祖进香活动^{③(P83-102)}。近年来,到安溪县感德镇石门村保生大帝祖居地谒祖进香的台湾保生大帝宫庙也越来越多。2009年11月14日,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进香团还特地给玉壶殿送来了“真人古地”匾额。

表面上看,台湾与东南亚信徒频繁的谒祖进香活动,仅是信徒认同祖庙的“中土”地位的一个结果。但是,郑一省的研究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郑一省指出,寻根是对祖先的一种认同,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尊敬祖先的情感,认同祖先实际上是对祖先背后的文化的认同^[2]。同样,海外三胞认同泉州祖庙,实际上是认同祖庙背后的文化。张新鹰认为,民间宗教信仰“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过程中愈加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影”^[3]。因此,祖庙背后的文化,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可见,海外三胞返回泉州谒祖进香的活动,有利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形成民族向心力。而随着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海外三胞与祖国的联系将会大大加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有望早日实现。

如前所述,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正统”意识与“寻根”观念有助于促进政治和谐。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因素对政治和谐也存在消极影响。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政治方面的最大消极作用,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基础上的文化现象,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科学的无神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戴康生、彭耀的研究表明,当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如果宗教处于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矛盾对立的状态,宗教的负功能就要大于正功能^{[4](P194)}。当前,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处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矛盾对立的位置,决定了其存在与活动必然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显然,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信徒越多、活动

越热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可能性也就越大。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外,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宗教与民间信仰对基层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存在的。例如,我们在惠安县净峰镇莲峰村的调查中了解到,该村的神权要大于政权。莲花宫是该村全体村民共同拥有的一座宫庙,莲花宫董事会由村中较有威信的老人组成。村里的经济纠纷、人事纠纷,由莲花宫董事会负责调解;村里的文化事业、公益事业,也由莲花宫董事会一手操办。至于莲峰村村两委,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反而处于边缘位置。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信徒,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在参与宗教信仰活动时,也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宗教与民间信仰在侵蚀基层行政权力时,其负面影响还不是太明显。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以便防患于未然。

二、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建立在经济的高度繁荣之上的。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内含的一些因素,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进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首先,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是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形成的,浸润于带有强烈的商品交换意识与商业观念的宗教信仰中的泉州民众,能够更好地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

历史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繁盛与当地民众频繁的海外贸易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泉州地处滨海,田土贫瘠,人口众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因海之便,出洋谋生。海外商贸活动的利润大,风险也大。因此,泉州民众对神灵极为崇拜,希望借助神灵的庇佑来求得平安顺遂。每次出洋归来,泉州民众都要举办仪式,答谢神灵的庇佑。而出洋贸易的丰厚收入,又使得泉州民众在举办仪式活动时大肆铺张,极尽奢华。可以说,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繁盛,与当地民众频繁的海外商贸活动之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泉州民间信仰是在海外贸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使得在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中,泉州民众与其他地区的民众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当其他地区的民众被经济建设的大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时,泉州民众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

其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包含着的一些信仰理念,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据国外学者葛希芝(Hill Gates)的研究,烧纸钱的做法隐含着商业动机:

“一般中国民众把钱当成与超自然交易的手段,试图通过贿赂神灵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保佑,而保佑往往指的是经济的实利。”另一位学者郝瑞(Steven Harrell)认为,中国人的命运观可以分为“命”、“运”两字。“命”是先天决定的,不可改变的,但“运”强调后天的努力和运作,是“民间的商品化意识的表现”^{[5] (P176)}。这两位学者都认为民间宗教信仰中包含着信徒在经济方面的考虑。泉州号称“佛国”,民众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因此,泉州民众很早就受到宗教信仰中所含有的商业意识的浸润与渗透。改革开放后,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时代主题时,熟稔于与超自然力量“交易”的泉州民众,很自然地将这种交易意识运用于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对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的一些竞争性的信仰仪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很明显。“晋主”与“搏龟”仪式即带有很强烈的竞争意味。“晋主”指村民将自家祖先的灵位晋奉到祖祠。“晋主”讲究等级化,规定晋奉到祖祠的祖先必须在辈份与道德威望上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过,民间在实际操作时,允许一般家庭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晋奉灵位的权利。“搏龟”指的是信徒通过许愿、占卜的方式来博取来年群体性仪式的主办权利。民间认为担任仪式主办者(头龟、头家)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福气,所以许多信徒不惜钱财,在神前许愿,争取成为来年神明诞辰的“头家”。王铭铭认为,“晋主”与“搏龟”仪式的存在使每一个有意愿的村民都有机会成为村里的“显要人物”,“此类显要人物并非政治现实中有政治资本的权力代言人,而是以财物的所有权与欲求为资本。把这一类竞争性仪式看成是‘民间资本主义’的表演,实不为过”^{[6] (P144)}。就是说,村民要想通过竞争性的仪式成为村里的“显要人物”,就要努力赚钱,再将金钱转化为“面子”。因此,竞争性仪式的存在,对于激发民众发展经济的热情是很有帮助的。

德化县的祭窑仪式,也是窑工之间的一种竞争性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是该县窑工祭祀当地烧窑先驱窑坊公(原名林炳)的日子。这一天,全县在祖龙宫设坛举行祭窑仪式,其他窑场以窑户所在的村落为单位,各自在祖厝或较大的民房设坛举行祭窑仪式,供品为新烧成的最好的瓷器。祭窑仪式中,组织名、优、特、新产品评比活动,“在活动中互相交流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创新和科技进步”^{④ (P380)}。可见,祭窑仪式中的产品竞争,有助于提升德化的制瓷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四,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可以活跃民众的社交圈子,使人脉关系服务于经济活动。王铭铭指出,“如果说民间社会网络有助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那么民间宗教就是通过辅助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而间接地服务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6] (P142-143)。下面以南安市洪梅镇坝顶自然村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坝顶村的成年男子95%以上都在全国各大城市从事海鲜贩卖活动。每到村里的佛生日时,村民无论远在哪里,都会想方设法返乡参加祭祀活动。因此,一年三次的佛生日,是坝顶村最热闹的时候。在外做生意的村民都要返乡参加佛生日的庆祝活动,同时还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赴宴。这样的一种场合,给村民之间的互通有无提供了舞台。笔者发现,佛生日时,在不同城市经商的村民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生意做的不成功的人,会向成功者取经。成功者也会给不成功的人提供一些生意上的门道。因此,佛生日是身处不同城市的村民彼此之间加强联系的一个重要舞台。村民通过返乡参与群体性仪式活动,加强了与其他村民的联系,人脉关系得以服务于村民的经济活动。

最后,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经济方面的积极意义,还表现在它具有旅游价值,可以进行旅游开发,吸引外来消费,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商贸经济。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都有相关论述,此处从略。

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某些合理内核在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泉州民众在与超自然力量交易时,其头脑中的商品交换意识有助于其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但是,宗教信仰中的这种商品交换意识,也会使信徒盲目相信投入越多回报越大,为了得到神祇更多的回报,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大肆铺张,由此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

例如,晋江市石鼓庙每年神诞期间的演戏活动,靡费之巨,令人震惊。据庄长江调查,从1980年到1997年,石鼓庙每年神诞的演戏天数呈现急剧攀升的态势,从1980年的20几天发展到1997年的89天^⑤(P73)。笔者2008年12月份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庙中贴有一张“石鼓庙敬戏表”。据该表的安排,从农历十一月初一至二十九,每晚都有戏剧演出。石鼓庙主神的诞辰是农历九月,但到了十一月,戏剧演出仍持续不断。据了解,每场戏的戏金在数千元至上万元之间,连续百余天的演出,经济上的花费相当之大。

泉州民众花费在普渡上的支出也很可观。近年

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三令五申下,普渡的铺张浪费风气有所扭转,但情况仍不容乐观。例如,石狮市锦尚镇东店村以校庆的名义,筹集百万资金,举办十八年一遇的“大普日”^[7]。

三、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也会从文化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产生影响。

首先,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社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外,也允许其他的文化形式的存在。泉州多元宗教并存的状况和宽容的传统,对于今天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泉州社会的实践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帮助。例如,泉州通淮街短短一两百米内,耸立着府文庙、清净寺和关帝庙三大寺庙。府文庙是儒教活动场所,清净寺是伊斯兰教寺院,关帝庙是道教宫观,三个不同宗教的寺庙并列一起,构成了一幅怪异而又和谐的画面。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个宗教场所内,也可以找到不同宗教的信仰要素怪异而又和谐并存的画面。例如,开元寺大雄宝殿须弥座束腰间嵌有七十二幅辉绿岩狮身人面像和狮子浮雕,大雄宝殿后廊檐间有一对十六角形的辉绿岩石柱,雕刻着二十四幅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草图案。这些雕刻精美绝妙,富有异国情调,是明代重修大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建殿的。泉州天后宫寝殿前廊的两根石柱,雕刻有印度教的花草图案,应该也是从已毁的古印度教寺移来的。由上可见,历史上多元宗教文化的并存与共融,为泉州营造了一个文化宽容的良好氛围。这样的氛围,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来说,有着很大的益处。

其次,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一定区域的民众在与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它决定了宗教与民间信仰身上必然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当前,全球化浪潮使得世界文化同一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保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未来生活的丰富多彩。2005年,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公约》提出,各个国家和民族有保留自己文化的权利,世界不能只听一种歌曲。在反对世界文化同一化的行动中,以泉州为主要代表的闽南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于2007年被我国文化部列为闽南文化保护试验区。而在泉州文化中,又以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最为鲜明。外来的游客通过巍峨壮观的开元寺东西塔、浑然天成的老君岩石像、古朴典雅的清净寺、香

火氤氲的关帝庙等宗教景观,便可体会到泉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地域文化特色之载体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是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和谐的角度,推动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的。

再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民艺展示、民艺保护的功能。民间艺术“或是源于祭祀神灵的仪式,或是古老神话的演绎,或是从祈福驱邪的巫术中脱胎而出”^[8],和宗教与民间信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是民间艺术得以展示和保护的前提。例如,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妈祖信俗,它的展示离不开信徒的信仰活动。只有在信徒实际的信仰活动中,妈祖信俗的生命力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也只有在实际的信仰活动中,才能显示出妈祖信俗的优美形式与丰富内涵。

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民艺保护功能,则主要是通过民间文化市场的运转来达成的。众所周知,许多民间艺术在新的文艺形式、娱乐方式的竞争下濒于消亡边缘。但是,当前政府在民间艺术保护上的投入还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民间艺术能够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必须借助于民间文化市场的运作。据我们调查,民间文化市场能否运作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盛衰程度。我们曾采访泉州西门外新高甲戏剧团的负责人,据其介绍,该团一年演出200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的演出,都与佛生日、进香、普渡等涉及宗教信仰的活动有关。可见,泉州民间戏剧的生存,是建立在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派生出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之上的。此外,在迎神赛会等宗教信仰活动中,民众不仅要演戏酬神,还要聘请大鼓吹、高跷队、火鼎公、火鼎婆、宋江阵、十八学士、驴子探亲等艺阵队伍来装点场面、烘托气氛。可见,与民间戏剧的生存方式相同,民俗艺阵能够传承下来,也要归功于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举办。

第四,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还可以起到丰富基层民众文化生活的目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民众的休闲娱乐时间也随之大幅增加。但是,基层政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即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缺乏主导精神的引导,各种各样的思想、价值观乘虚而入,占领基层文化阵地。在各种各样思潮的侵蚀下,基层民众容易出现思想迷茫,找不准人生定位,导致行为的失范与越轨。例如,由于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基层民众的腰包鼓起以后,得不到正确的消费指导,不少人开始沉迷

于赌博之中。这既败坏了基层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容易引发治安问题,导致基层社会的震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及其运作,可以起到丰富基层民众文化生活,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例如,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老人在管理,老人有了休闲娱乐的去处,同时也有了发挥余热的场所。这对于老人幸福快乐地度过老年时光,有着很大益处。而群体性的仪式活动中,民众不仅要聘请剧团、电影放映队、艺阵队伍来增加热闹,而且民众自身也是演员,要参与祭祀、游神、宴客等活动。这种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使得基层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仪式活动带来的快乐。而且,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作为历史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形式,它比政府倡导的新文化形式更容易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同。在基层民众的眼中,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政府倡导的新文化形式,则是外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文化形式。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泉州的基层文化建设中,要充分重视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积极作用。

宗教与民间信仰毕竟是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具有群众性、狂热性、盲目性的特点,对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其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边陲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但是,边陲的地理环境,也使得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衍生出一些低级的文化形式。例如,历史上,泉州的宗教信仰活动中,往往都有戏班演戏助兴,娱神娱人。戏班为了吸引观众,经常演出一些打情骂俏、轻薄堕落的剧目。改革开放后,随着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复兴,色情演出又渗入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中。一些现代剧团为了抢夺庙会市场,将脱衣舞等不堪入目的色情表演,也列入演出。2009年,有网友在福建论坛(www.bbs.66163.com)上贴出一则新闻:晋江市某乡镇一户人家出殡时,请了两个脱衣舞女在出殡现场大跳脱衣舞,驻足旁观者不少。这些低级趣味的演出,成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身上的寄生虫,毒害了社会风气,是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文化方面消极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在基层文化建设效果尚不明显之际,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丰富了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当政府试图加大基层文化建设的投入时,宗教与民间信仰就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新的文化形式进入基层的阻力。因为,当基层民众的思想世界为宗教与民间信仰占据以后,他们就很难再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新

的文化形式。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综上,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讨论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当然,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一种和泉州民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形式,它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显然要超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范畴,而是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民众的文化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德说教,可以起到社会的道德控制作用。而且,有别于法律“后于事”的社会控制,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德控制是“先于事”的。民众在抉择时会受到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德说教的影响,使之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7] (P32)}。又如,改革开放后,泉州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得到同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宗教活动场所扮演了民间“福利”中心的角色,对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作用。近年来,泉州开元寺、通淮关岳庙等香火较旺的寺庙,每年都拨出大笔经费用于扶助鳏寡孤独、助学兴教等社会公益事业。再如,转型社会中,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使得原来的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整个社会出现陌生化和疏离化的趋势。而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加强了村落社区的团结,部分消弭了转型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例如,群体性的信仰仪式的定期举办,使流动在外的人口定期团聚在一起,定期重温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总之,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中,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作用。

注释:

①周仪扬. 沪江宝泉庵[Z]. 晋江: 沪江宝泉庵董事会

印,2005.

②郭山庙管委会. 南安市诗山郭山庙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祈禱国泰民安法会”[J]. 福建道教,2005,(3).

③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 泉郡富美宫志[Z]. 泉州: 泉郡富美宫印,1997.

④陈建中. 窑神祭祀仪式对泉州窑德化陶瓷技术进步的探讨[A]. 华侨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 泉州: 华侨大学印,2008.

⑤庄长江. 石鼓庙戏剧演出景观[A]. 晋江市历史文化研究总会、石鼓庙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编. 闽台石鼓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晋江: 石鼓庙印,1998.

参考文献:

- [1] 詹石窗. 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作用[J]. 世界宗教研究,2001,(4):99-105.
- [2] 郑一省. 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民俗活动[J]. 东南亚研究,2003,(6):66-71.
- [3] 张新鹰. 台湾“新兴民间宗教”存在意义片论[J]. 世界宗教文化,1996,(2):8-10.
- [4] 戴康生,彭耀. 宗教社会学[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 [5]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1997.
- [6] 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闽台三村五论[M]. 北京: 三联书店,1997.
- [7] 东店村“禁普”以校庆的名义[EB/OL]. 2005年8月1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5-08-18/03346717481s.shtml>.
- [8] 向柏松.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5):66-70.

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upo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ake Quanzhou as a Case Study

GUO A e¹, FAN Zheng yi²

(1. The Research Centre of Quanzhou Relics, Quanzhou 362000, China;

2.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thriving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have influences upo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wo aspects. On politics, the realizing of orthodox and seeking roots make harmony in politics. On economy, the realizing of commodity exchange mak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ulture, the existence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make the appearing of multi-culture. Meanwhile, the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also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upon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Quanzhou;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harmonious society; influence